

林语堂文艺美学思想的现代人文精神

李 灿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林语堂文艺美学思想曾受到左翼文人的批判,从现代价值观出发,其思想建基于当时中国与西方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以“人生”为核心,关注人类的实际生存困惑,饱含批判与创新,充满了现代人文精神。

[关键词] 林语堂; 文艺; 美学; 现代; 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 I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4)03-0105-04

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大陆文艺界对林语堂的文艺美学思想缺乏更为深入的了解,曾从现实和政治的层面对其加以片面的否定。然而,从现代价值观出发,林语堂文艺美学思想建基于当时中国与西方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以“人生”为核心,关注人类的实际生存困惑,饱含批判与创新,充满了现代人文精神。

一 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林语堂文艺美学思想

当西方文艺思想受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而走向对理性主义美学传统的颠覆之旅时,中国近现代也开始出现一股人性解放的暗流,以李贽、王夫之、颜元、戴震为代表的思想家对深受封建意识形态控制的文化传统作出了尖锐的批判,这为中国近现代文艺界的大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反对几千年来封建制度强加给我们的“非人的文学”,要求文学“辟人荒”,并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将中国的文学分为“文以载道”和“诗言志”两个流派,林语堂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性灵”在现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试图以“性灵”为旗帜,推翻陈腐的、桎梏人性的“载道”文学。

林语堂对封建制度束缚下的“文以载道”深为不满:“那些说教的文学大体上均属品质低劣的次等作品,充满了宣扬道德的陈腐之说和质直的理论,思想的范围又为畏惧异端邪说的心理所限。故中国文学可读者,只是那些含有西洋意识之文

学。”^{[1]205-206}林语堂文中所说的“含有西洋意识之文学”指的是文学关注个体生命的真实存在,打破封建意识形态在主题、题材、语言等方面对文学所形成的禁锢,敢于并善于表现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和人性人情。为实现中国文学的现代变革,林语堂强力推崇中国的“性灵”思想,试图阐发这一在中国长期被压抑的边缘文学的价值和意义。由此,他对一批“性灵作家”情有独钟:屠赤水、徐渭、汤显祖、张岱、李渔、张潮、郑板桥……将其作品翻译成英文并加以传播。他甚至还对孔子形象作出新的诠释,在林语堂所著的《孔子在雨中歌唱》、《论孔子的幽默》、《再论孔子的近情》等文中,他根据原典来描述孔子言行之近情合理,将孔子从严肃古板的“圣人”还原为性灵可亲的“凡人”。可见,林语堂以“性灵说”作为个性解放的利器,志在铲除“存天理,灭人欲”的文化毒瘤。在与深受白璧德影响的梁实秋、吴宓的论战中,林语堂翻译了克罗齐、斯平加恩的部分文论,介绍西方现代的表现主义美学思想,并以“性灵说”来对抗中国的“古典主义”文艺思潮。“林语堂以中国的‘性灵’思想来印证西方的‘个性’文学,试图从中寻找两种不同文学实行沟通的渠道。”^[2]这也使其文艺美学思想具有跨文化的特质:“中西近代美学思潮不经意地应合、汇通,使林语堂有种豁然开悟之感,其视野与胸襟均为之而扩展,所以浪漫派、表现主义、个性、性灵这些字眼,在林语堂的有关文章中常是糅合在一起,互渗交融。”^[3]这一跨文化的比

[收稿日期] 2014-04-26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林语堂文艺美学思想的现代人文精神”资助(课题编号:11YBB325);湖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项目“林语堂文艺美学思想研究”资助(课题编号:11C1123)

[作者简介] 李灿(1979-),女,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较和交流实际上体现了当时整个世界在文艺美学上要求挣脱古典主义理性枷锁,并按照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重构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的的人文理想的要求。

然而,出于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左翼作家曾认为林语堂的文艺美学思想极其不合时宜:“林氏(或者说克罗齐氏)的个性至上主义作为对于几千年来愚民的封建僵尸的否定,原应该是一幅英气勃勃的风貌,但可惜的是,在这个大地上咆哮着的已经不是五四的狂风暴雨了。我们并不是不神往于他所追求的‘千变万化’的个性,而是觉得,他的‘个性’既没有一定的社会的土壤,又不受一定的社会限制……我们不懂林氏何以会在这个血腥的社会里面找出了来路不明的到处通用的超然的个性。”^[4]可见,林语堂的文艺美学思想之所以受抨击主要是因为“五四”时期所追求的“个性解放”的思想已经被新时期的“救亡图存”这一更为宏大的主题所取代。“个性解放”无法拯救“血腥的社会”,也不能快捷有效地实现文学干预社会的功能,因而被认为是缺乏“社会的土壤”的乌托邦。但从跨文化的角度而言,林语堂“性灵说”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与西方近现代文艺美学思想相交融的产物,有利于加速中国文艺摆脱封建专制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从而建构真正体现现代人文精神的中国新文艺。

二 西方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林语堂文艺美学思想

林语堂文艺美学思想不但对当时的中国文艺界具有思想启蒙的效用,而且对当时西方的文化困境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他认为西方社会由于科学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极端发展而导致了人文思想的危机:“因科学的物质注意必然走上定数论、宿命论,而定数论(否认自由意志)必然走向悲观。所以现代最风行一时的思想家(不是最伟大而是最风行的)都是悲观主义者,并非偶然。我们国际的混乱是基于哲学上的悲观:Baudelaire 的悲观,Huysmans 的悲观,Hardy 的悲观,Dreiser 的悲观,T. S. Eliot 的悲观,Proust 的长恨,Samuel Butler Dean Inge、Aldous Huxley 的悲观,Picasso 的激烈悲观,及那些超现实派的画家,佛洛伊德信徒,心理变态者,激越唯美派等。只有理智健全的 Walt Whitman 未曾感染那种科学风气,日与人生人类相接近,才能保存那对人类平民的博爱与信心。我可以有趣地指出新英格兰(美国东北部)文化全盛时期的巨子(19 世纪中叶)都接近中国的文化:Whitman 的玄学及爱好有血有肉的人类,Thoreau 的反战主义及接近大自然,Emerson 的妙悟能力及格言式的讲解。那灿烂的时期过

去了,因为工业时代的精神已经给他摧残了。”^[5]西方近现代以来,个体与社会、感性与理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与西方现代人文主义思潮相呼应,林语堂强调以一种审美情怀去调和这种人性的分裂状态,使人生达到和谐完整。不同于西方现代极端灰暗的“反理性”的文艺思潮,林语堂之“性灵”说仍然是中国温润的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的产物。在“性灵说”基础上,他倡导“幽默”,这一审美形态是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流的结晶。它一方面深受西方科学民主精神之影响,要求打破封建思想对人性的桎梏,以对世事人情作穷形尽相的真实表现,另一方面则吸收了中和、神妙等中国传统美学风貌,从而使之既具有西方气质,又饱含中国韵味。总之,这一跨文化美学成果建基于对中西方生存境遇的高度关注,通过对中西方美学资源予以融汇和创新,张扬了现代人文精神。

林语堂虽翻译西方浪漫派与表现主义美学流派的作品来提倡中国的“性灵”,但林语堂之“性灵”却不是西方近现代文艺思潮的翻版。与“性灵说”相比,西方由于受天人分立、心物二分的文化特质的影响,在反传统、反理性上更为彻底,乃至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西方表现主义似更注重感情须发泄殆尽,甚而表现人的潜意识和下意识。西方表现主义似从未关注过表现的感情是否高下良莠,是否引人向上,因为在他们看来,人在文艺作品中宣泄发露感情从来都是正当的,这是人的本能范畴内的集体无意识行为,也是艺术的本质使命。”^[6]这种极端的反理性的倾向是由西方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所导致的,在以“中和”为文化之根的中国文艺界是罕见的,也有别于林语堂的“性灵说”。林语堂虽反对“载道”文学,但并非陷入“反理性”的漩涡,其“性灵”并非绝对排斥“理性”。林语堂曾指出:“虽然说文不必载‘道’,至少要与人生之真义有点接触。所谓真义,自然也不限于圣道和礼教,无论是中国的或西洋的。”^[7]他认为文学虽不必局限于“载道”,但却应有其深厚的人文底蕴,即体现“人生真义”,以避免“性灵”走入肤浅、空疏、狭隘、颓废、荒诞不经等“反理性”的死胡同。“倘能把人生比作大城市,那么人类的著作可以比作屋子顶阁上的窗口,人们可由以俯瞰全景,读着一个人的著作,吾人乃从作者的窗口以窥察人生……但从窗口里面窥探的城市景色是具个性的,是有各自的特殊面的。”^{[2][207]}可见,“人生”是林语堂美学思想的核心要素,林语堂虽要求文艺从内容到形式上打破古典美学的各种金科玉律,但却强烈要求文艺必须与“人生”水乳交融:“不管你存

意为人生不为人生,艺术总跳不出人生的。文学凡是真的,都是反映人生,以人生为题材。要紧是成艺术不成艺术,成文学不成文学。要紧不是阿Q时代过去未过去,而是阿Q写得活灵活现不,写得活灵活现,就是反映人生。”^[8]在林语堂看来,文艺以社会人生为具象资料,并因此而具有深厚的人文内蕴,文艺既具有审美的无功利的感性特征,又承载着人类最高的价值期许,是有限无功利性和人生最高功利性的有机的统一,具有鲜明的人文价值。

林语堂以“性灵”、“幽默”为核心的文艺美学思想不仅在文学和美学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而且还有利于促进世界文化的健康发展,从而凸显了文艺美学在现代社会所应具有的人文精神。

三 林语堂文艺美学思想的现代人文精神

林语堂文艺美学思想在中国曾遭遇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客观上,中国当时正处于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以极端实利的态度要求文艺直接服务于政治,这是主要因素;主观上,林语堂文艺美学思想多局限于文学语言的描述,缺乏比较集中系统的阐述,其思想具有零散性和庞杂性,容易引发误会和争议。

林语堂以“性灵”为核心的文艺美学思想主要内涵如下:其一,文艺不应仅仅成为理性教化的工具,而是个体性格和灵韵的感性显现;其二,文艺也并不是单纯的主观想象的产物,它与人生密切相关,从中获取灵感与素材;其三,文艺应体现当代人文精神,是有限无功利性与人生最高功利性的统一。这一文艺美学思想是整个世界在近现代以来要求打破传统理性桎梏,追求个性解放的运动的产物。一方面,林语堂高度强调文学的自律性因素,反对古典美学法则对文学内容及形式上的各种束缚,要求文学保持其独立的审美属性,文学虽与宗教、政治、经济、道德、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却不能成为这些外在势力的傀儡。另一方面,林语堂对文学的他律性因素也有所探讨,他期待文学能在保持其审美属性的前提下成为现代人文精神的载体,他反对文学成为陈腐的封建思想的“传声筒”,更担心文学在现代社会沦为权势和金钱的奴仆。因此,林语堂文艺美学思想既抨击了过分严肃的庙堂文学,又避免了过分肆虐的媚俗文学,既讲求文艺的自律性,又包孕新的人文精神,达到审美价值、人文价值的有机统一,不但是对中国文学正统的伦理中心主义思想的解构,而且是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与其现代非理性的偏激思想的反拨,其思想饱含着批判与创新。

“林语堂的东西文化观实际上是一种在国际文化的广阔背景下探讨传播本土文化的新途径、新道路。它是对自己的古典文化传统,也是对西方古典文化的‘重写’、‘批判’及至‘扬弃’。”^[9]林语堂所倡导的现代人文精神正是建立在对中西方文化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的,这使他的文艺美学思想及其本人的文学创作充满了创新性,其散文更多着眼于“破”,例如《讽颂集》对各种不符合现代人文精神的社会现象进行淋漓尽致地描摹,常常寓“批判”于“幽默”之中,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还是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解剖,都能入木三分。在《讽颂集》所收录的文章中,从《遗老》、《狗肉将军》到《挖金姑娘》、《乞丐》,林语堂对各种文化素材和社会现象皆能形神毕备地加以呈现,既充满人文关怀,又耐人寻味;其小说则更多倾向于“立”,例如《奇岛》善于融会古今中外的各种人文传统。作为美国华文文学的经典之作,《奇岛》虚构了一个远离战乱和灾祸的小岛,岛上的居民虽来自不同国家,但他们却能吸取世界各种文化之精华达到“和而不同”的理想境界。作者以神奇的幻想营构了一个超越文化差异的符合现代价值观的新的理想人文世界,虽然颇具“乌托邦”色彩,但却令人对此“世外桃源”欣羡不已。

林语堂文艺美学思想是跨文化交流的产物,它加强了中西文化的融通,有利于中西双方扬长避短,不断创新。正如林语堂所言:“我想我们此后的新文化也不必由新时代潮流而引起激变,由东西文化交流之汇通,而挹彼注兹,相辅相成,收得新的光辉与生命。”^[10]这种跨文化尝试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使林语堂文艺美学思想充满了现代人文精神,其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1]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林语堂名著全集:第20卷.黄嘉德,译.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2] 王兆胜.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5:135.
- [3] 俞兆平.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四种范式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91.
- [4] 胡风.林语堂论[M]//子通.林语堂评说七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252.
- [5] 林语堂.西方人文思想的危机[M]//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6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06.
- [6] 韩铁棒.中西表现论的比较[J].文艺理论研究,1988(5):47-52.
- [7] 林语堂.新的文评[M]//林语堂名著全集:第27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292.

- [8] 林语堂. 做文与做人[M]//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7卷. 社,2003:383.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256.
- [9] 孟建煌. 从“后殖民主义”话语看林语堂的东西文化观[M]//子通. 林语堂评说七十年.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
[10] 林语堂. 关于文化复兴的一些意见[M]//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6卷.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65.

The Modern Humanistic Spirit of Lin Yutang's Aesthetic Thoughts of Literature and Art

LI Ca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Lin Yutang's Aesthetic Thoughts of Literature and Art were once criticized by the left-wing literati in the past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factor of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But according to modern idea, his thoughts was based o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and paid attention to human's actual living perplexities, reflected the modern humanistic spirit.

Key words: LinYutang; literature and art; aesthetic thought; modern; humanistic spirit

柏杨文学思想的特点

张清芳、陈爱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0期撰文指出,纵观台湾作家柏杨在五十余年间的文学创作,贯穿其中的是对中国现代市民自我主体性的建构。对这一创作主旨与文学思想,他通过“破”与“立”两个面向来实现,前期创作以“破”为主,旨在清除中国愚昧民众负载的封建传统文化和国民劣根性。柏杨把清除工作的重心放到了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糟粕的猛烈批判和针砭上,并深刻地总结出这种文化的根本性特征——“酱缸文化”。正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酱缸文化”使中国人丧失了自尊、人性尊严和自由平等意识,以至心理扭曲变态产生了四类“畸形人”——封建帝王、“圣崽”、“官崽”和以做官与当圣人为最高目的的普通民众。在《丑陋的中国人》中,以“丑陋的中国人”来代替“畸形人”形象,“酱缸文化”批判的范围更加广泛。不过包括“酱缸文化”批判在内的更加广泛的消除工作,只是柏杨文学思想的一个内容,而他在文学作品中对中国现代市民主体性的具体建构,则是另一个核心。柏杨最早关注的是中国现代女性市民主体性的形成和确立,随后是对现代国人内在人格的建构,再到所有“中华人”自我主体性的建构,亦把被生活压轧的普通小人物纳入范畴中,并力图在“苦难意识”中建构起他们的自我主体性,最后又重返中国历史的深处,以文化“现代化”为背景,把诸多中国历史人物的现代化问题也归入现代人主体性建构的框架中进行考察。在柏杨看来,随着具有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特点的现代中国的建立,以及中国现代市民主体性的建构成功,完全有可能消灭和消除“丑陋的中国人”的人性弱点和人格缺陷。这亦是柏杨在史传作品中以“建设”为主,不同于此前作品的以“破坏”为主的重要原因。